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能動者與結構：在本體論分析層次上的爭論

Agent and Structure: The Ontological and Level-of-Analysis Debates

doi:10.30390/ISC.201203_51(1).0001

問題與研究, 51(1), 2012

Issues & Studies, 51(1), 2012

作者/Author：宋學文(Hseik-Wen Soong);陳文政(York W. Chen)

頁數/Page：1-3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03_51\(1\).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03_51(1).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能動者與結構： 在本體論分析層次上的爭論

宋學文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陳文政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體論為任何研究之始，能動者／結構爭論為以 Waltz 為首之結構現實主義與 Wendt 為代表之建構主義在本體論層次的重要歧異點之一，為此，兩派學者自 1980 年代末葉論戰迄今。儘管本體論的問題具有政治性，不見得有終極與明確的答案，但藉由本體論的討論可以讓吾人更能瞭解兩派理論在深層假設的異同。本文在敘明能動者／結構爭論在理論發展上的重要性後，進行爭論中相關重要概念——如能動者、能動性、結構等——的闡述，除追蹤這些概念在社會學上的根源外，也討論了 Wendt 在國家能動性的論點與「中間道路」在本體論上的立論基礎等幾項建構主義者在概念上引發爭議之處。在能動者／結構爭論中，建構主義者對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提出兩項批判：Waltz 實乃個體主義者與 Waltz 的結構制約單元的論點忽略能動者的能動性。本文綜整 Waltz 在國家是「單元」、結構的「形成」、結構的「屬性」、結構的「效應」、結構的「變化」等五項相關論點，本文認為：以結構決定論的標準觀之，Waltz 的觀點固然與 Levi-Strauss 與 Wallerstein 等厚實的結構主義有段距離，但從 Waltz 對結構與單元的嚴加切割，及其與 Durkheim 之間的應合，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宜視為一薄弱形態的結構主義。儘管如此，Waltz 雖做了許多在方法論上向單元層次傾斜的修正意見，但他在本體論上依舊欠缺對能動者的能動性與該能動性可轉型結構的相關認識，結構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在能動性上的差異依舊鮮明。最後，本文認為：基於分析層次表陳所意涵之理論簡潔度的重要性與必然性，即便對於相對複雜性的建構主義，分析層次的表陳依舊是必須面對的挑戰，本文即提出在本體論上能動者／結構的討論範疇內一個能夠凸顯 Waltz 與 Wendt 立場差異性的分析層次表陳。

關鍵詞：結構現實主義、建構主義、本體論、能動者與結構、分析層次

壹、前言

在國際關係的理論發展上，以 Kenneth N. Waltz 為首的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乃是在傳統的現實主義 (realism) 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假定上，復結合了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的整體論 (holism) 觀點：①以「結構」(structure) 構成了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Waltz 以從國際體系、國家與個人等三個分析層次 (level of analysis) 上來解釋國家的行為，②但他強調兩點：第一，在解釋來源 (source of explanation) 上，③儘管每個分析層次代表不同的理論主張，但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下，各國依能力配布之國際結構而行為，此一結構特性最能解釋並預測國家的行為，亦即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能動者」(agent)，其「能動性」(agency) 為國際結構所制約，此一「結構制約單元」論點被普遍認為是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精髓。第二，就分析單元 (unit of analysis) 而言，Waltz 言：「若不能指出並保持結構相對於單元及〔單元互動〕過程的區隔，就無法分辨不同種類的成因，也無法辨別成因與結果。……而這正是國際政治理論發展上的主要障礙。」④ Waltz 以國際體系中結構特性來解釋或預測體系內國家 (即單元) 的行為，其目的之一即是在本體論的立場上嚴明「國際」政治的學科界線，⑤必須是以國際體系為分析單元與解釋來源的理論才足堪稱「國際」政

註① 結構主義為「源自語言學並應用到其他領域的觀點，意指現象應從組成體系內之常數予以了解。」而整體論則為「堅持社會必須以其整體 (而非其個體) 去予以了解。是故，個人或特定事件只能從其所處之社會系絡中予以了解。」見：Roger Trigg,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Blackwell, 1987 [1997]), pp. 209, 212. 除引文外，本文以下中有兩關名詞之使用，於涉及本體論時使用結構主義，於涉及認識論或方法論時使用整體論。

註②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1959]).

註③ Barry Buzan 認為分析層次具有本體論 (ontology) 與認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兩層意義，就本體論的意義，不同的分析層次意味不同的分析單元；在認識論上的意義，不同的分析層次代表不同的解釋來源。見：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1997]), pp. 203-205. 作者認為 (見本文第參節)：後一說法似有疑問，解釋來源應為方法論 (methodology) 或甚至是理論實質內容上的問題，而 Buzan 認為此為認識論的問題，顯與一般對認識論的看法有所出入 (見本文註⑤)。

註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1979 [2010]), p. 78.

註⑤ 簡單地說，本體論乃「關於事物存在的研究或科學」，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特指「對於某一研究途徑對於社會實體本質構成——包括對於實體如何存在、外觀如何、由哪些單元所組成以及這些單元間如何互動等等的主張與假定。」而認識論乃「關於知識之方法與理由的科學或理論」，在科學哲學領域中「認識論是知識的理論，它代表什麼可以被稱作知識以及認定的標準等等的見解。」至於方法論是「對研究如何進行的分析，包括了理論如何產生與驗證、使用的邏輯結構、前兩項的標準以及針對特定研究議題的理論架構應該為何等等議題。」至於方法，則是「研究者特定研究問題與假說所使用之搜集與分析資料的技術。」見：Norman Blaikie,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pp. 6-7.

治的理論。易言之，對 Waltz 而言：結構，除在方法論與理論實質內容上是較佳的解釋來源外；更重要的，它是國際關係研究作為學科的本體論基礎，離開了結構的分析單元，就脫離了「國際」政治的學科範圍。

近年來，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m, 以下簡稱建構主義) 研究者對結構現實主義展開系統性批判，也引起了國內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的重視與討論。雖然有學者批評：建構主義很難能被稱爲是「理論」，或甚至它也不是「政治學」的理論。⁶然而，就算建構主義僅是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未必能直接有助於國際關係特定理論的具體發展，但建構主義研究者藉由引進許多社會學概念，對「形構國際政治的研究議題與研究途徑」確有貢獻。⁷特別是建構主義深入探討國際關係的核心假設，喚醒相關研究學者對於本體論的重視，對學科的發展極具啓發。⁸

不過，建構主義者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判，並非旨在全盤否定結構現實主義，至少就建構主義中溫和派 Alexander Wendt 的觀點而言，從對「國際」政治學科界線上的堅持、以國家爲核心的結構性論理以及認識論上的兼採實證主義 (positivism) 立場等相同點來看，Wendt 與 Waltz 的觀點實不乏共通之處。⁹建構主義對結構現實主義主要的批判集中於本體論面向，¹⁰其爭點大抵有二：

一、唯心主義 (idealism) / 唯物主義 (materialism) 的爭論：唯心主義認爲社會的本質與結構由觀念所構成；而唯物主義則認爲由物質條件所構成。部分當代的唯物主義修正論者固略爲重視理念的角色，認爲行爲由理念所啓動，但還是主張理念終究是由物質環境 (特別是物質上的利益) 所形塑，因此，理念仍無本體論上的

註 6) Lars G. Lose 即聲稱建構主義「很難能被稱是國際關係的實質理論，而僅是〔國際關係理論之〕後設理論上 (metatheoretical) 的研究起點」；同樣的 Martha Finnemore 也說「建構主義是社會理論，而非政治學的理論，它多在處理社會生活與社會變化的本質，並提出可發掘出結構與能動者彼此驅動力之連結的研究方式。但對社會結構的內容或能動者的本質，它並沒有提出特定理論主張。」分見：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 Lars G. Lose,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World of Diplomacy,"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Armonk: M. E. Sharpe, 2001), p. 181. 而後設理論，簡單地說，就是有關理論的理論，見：Harry D. Gould,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M. E. Sharpe, 1998), p. 85.

註 7)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6, No. 2 (1992), p. 422.

註 8) Knud Erik Jorgensen, "Four Levels and a Discipline," in Fierke and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2.

註 9) Alexander L.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 11-12, 39-40. 其他持此觀點的如：Ian Hurd, "Constructivism,"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10]), pp. 307, 310;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Longman, 1993 [2010]), pp. 291-293.

註 10)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

獨立性，仍無方法論上獨立的因果關係角色。在認識論上，唯物主義多與實證主義結合，並強調因果關係；而唯心主義，則強調建構效果。¹¹在國際關係的理論發展中，建構主義批判結構現實主義純以唯物主義與效益論為主的理論假定，並提出對規範與身分的強調來補充結構現實主義的不足。¹²

二、能動者／結構（或稱「行爲／系絡」）的爭論：建構主義質疑結構現實主義的「結構制約單元」論點，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制約固然存在，但卻不是既定不變的，此一制約來自於能動者彼此間與／或能動者與結構相互建構的動態過程，結構也可能在此一過程中獲得強化或轉型。¹³

本文將僅聚焦於第二項爭點。理由有以下二點：

（一）Vendulka Kubalkova 觀察了國際關係學科這二十年來理論發展，曾自省地說：「我們有增加而沒有累積，有重複卻沒有深入」。¹⁴前述兩項本體論上的爭點，任一都具有繁複的議題內容，都需要大量的閱讀與綿密的梳理。作者只能兩者擇一，乃希望在有限篇幅之下更為深入討論第二項爭點。

（二）建構主義流派眾多，但在能動者／結構的立場上較為一致，形成與結構現實主義清楚的對立；但相對而言，建構主義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的主張上則較為分歧。建構主義固強調理念因素，但誠如政治學者 Colin Hay 指出：建構主義並非純粹的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而是視物質與理念因素為辯證關係。其中，有所謂建構主義的「厚實形態」者，在辯證關係中強調理念因素與建構效果者，但也不全然否認物質因素的重要性；也有建構主義的「薄弱形態」者，則往物質因素傾斜並強調因果邏輯，持此觀點者多注意到在建構作用中物質世界所施加的制約。¹⁵因此，對唯心主義／唯物主義爭點的討論，需要進一步區分不同形態建構主義所持的不同立場，如此一來，極可能會模糊掉本文試圖針對建構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兩相比較的題旨。而且，也與本文第四節分析層次的表陳甚難契合。

在取材上，本文除以 Waltz 的論述為結構現實主義一方文本。在建構主義方面，本文並不尋求對於建構主義的全面性介紹或檢視，而事實上建構主義的流派眾多，彼

註 11 Colin Hay,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207–210;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3–25.

註 12 Jørgensen, "Four Levels and a Discipline," p. 43.

註 13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3, No. 3 (1989), pp. 451–454.

註 14 Vendulka Kubalkova, "Re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e: Scholars as Agents," in Kubalkova, Onuf, and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 200.

註 15 Hay, *Political Analysis*, pp. 206–208. 此處的論點亦可參照本文第參節中最末 David Dessler 在引文中所稱的「物質能力」與「意義架構」。同樣的，在本文第參節中也提到 Anthony Giddens 把結構定義為規則與資源，在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陣營中，Nicholas Onuf 認為規則與資源具有同樣的本體論重量（ontological weight），但 Wendt 則傾向強調規則重過於資源。見：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5.

此間的差異度也大，也很難能定於一尊。¹⁶ 本文選擇以 Wendt 為本，但並不以 Wendt 為限。Wendt 所主張的論點是否完全相符於社會學中的建構主義或是否可代表國際關係領域中建構主義的主流，雖可爭論；但難以否認的是：Wendt 確為國際關係中最負盛名的建構主義研究者；¹⁷ 而且比起後現代建構主義學派，Wendt 較為溫和的主張以及試圖與既有國際關係主流理論整合的嘗試，¹⁸ 這使得以 Wendt 等人的建構主義與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之兩相比較深具意義。¹⁹

本文將針對 Waltz 與 Wendt 在能動者／結構的議題上進行在本體論層次的深入探討。在正文的安排上，在第貳節，本文將指出：能動者／結構在本體論層次上的爭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上的意義。在第參節，本文針對結構、能動者、能動性等核心概念進行簡要說明，並提出建構主義的論點。在第肆節，除說明建構主義對結構現實主義在能動者／結構議題上的批判外，並提出本文對此的見解。在第伍節，本文主張：理解結構／能動者爭點的可行途徑之一，便是以分析層次表陳出能動者與結構兩者互動的關係與作用，作者引兩個國內外學者所提出之較能突出兩派學說在能動者／結構議題上立場差異性的分析層次表陳，並加以評述。

貳、能動者／結構的爭論在理論發展上的意義

能動者／結構的爭論，不是社會學的新議題，也有主張以其他形態的討論予以取

註 16 在社會學與哲學領域內，建構主義的各種分支流派可見：Andre Kukla,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5, 6, 19–21, 26, 119, 160–161。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建構主義的各種類型亦可分見：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p. 181;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K.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K.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pp. 36–37. Christian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1996 [2005]), pp. 199–200;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241–242.

註 17 根據統計，Wendt 被認為是當今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第二名學者。引自：莫大華，「國際關係後現代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立場」，《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究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政治學系：2010年5月），第3場，第2篇，頁19。

註 18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Wendt’s Constructivism: A Relentless Quest for Synthesis,”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73–77;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p. 241.

註 19 Wendt 對 Waltz 的批評廣為人知，但 Waltz 多只針對 John Gerard Ruggie 或 Richard Ashley 等較為資深學者的建構主義論點進行回應，而並未正面與 Wendt 的批評有所爭論，原因之一可能是當 Waltz 進行對 Ruggie 或 Ashley 的回應時（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Wendt 才是個剛剛取得學位、任教的學者。

代，²⁰更有若干國際關係研究者認為，此一議題不過是研究者的主觀選擇。²¹但深深受到社會學家 Roy Bhaskar 的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以下簡稱實存論）與 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雙重影響下之建構主義者則認為對本體論以及能動者／結構議題的探索在理論的發展上有重要的意義。本體論不僅與學科的邊界有關，與研究的客體是什麼有關；「本體論更是任何研究之始」，²²本體論的問題有其優先性，應先於認識論與方法論的議題；而本體論的混淆，也無法藉由認識論與方法論的辯論獲得澄清。²³Wendt 主張建構主義的本體論有助於建立「國際」政治的理論，而且不同的本體論出發點對於解釋真實的世界有重要的意涵。²⁴本體論作為研究之始，雖然「它的重要性常被認識論與／或方法論上汗牛充棟的辯論所掩蓋」，如同 Colin Wight 所強調，本體論觸及世界是什麼與應當如何等等國際關係的核心議題，所以它「不只是抽象的理論臆想，它意涵著甚至可能決定著政治與社會世界的建構。這也對如何理論化國際關係有所意涵。所有的理論都假定一個基礎的本體論，以此帶出其他的考量。因此，沒有本體論，就不會有理論。」²⁵

其次，本體論也與理論的解釋能力有關。本體論既在討論「理論所假定或其解釋所推出之真實世界的結構（事物或行爲體）與過程。某一論述的本體論雖不會決定但足以限制該論述的正確解釋。」²⁶據此，David Dessler 進一步指出，理論之解釋在顯示現象如何成爲該理論內在本體論的產物或面向，理論的解釋力視其減少無關現象之能力而定；亦即，視該理論如何顯示一些看似不相連結的現象而其實是一個共同本體論下的產物。因此，本體論既與被解釋項的範圍大小有關，一個理論越能減少無關現象的數量，也就是其內在的本體論越豐富、越全面，這樣的理論就越好。²⁷

註 20 有主張以社會系統區別化論點來取代能動者／結構所意涵的社會單元與整體等類似概念的區別，在此論點下，除系統（例如特定國家）與環境相區別外，環境中可存在多個系統，而每個系統內復可區分多個次系統，而原來的系統即爲次系統的環境，也就是說環境有大小與內外，而每個系統必須處理由外、內環境、其他系統與從屬該系統之次體系所構成的複雜性。見：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Jr. with Dirk Baecker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1984 [1995]), p. 18. Colin Wight 指出：社會系統區別化的觀點採取全然迥異的本體論途徑，在此概念下，單元的意義爲（次）系統所取代，也不存在建構主義傳統上對人類能動性的強調。見：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9.

註 21 如 Buzan 從分析層次的觀點認爲：結構與單元兩分析層次並不衝突，哪一個層次的主張佔上風，主賴於所欲解釋的現象；易言之，本體論不過是研究者的選擇而已。見：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pp. 212-214. 其他持類似見解者，如：Viotti and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96.

註 22 Robert W. Cox, "Towards a Posthegemonic Conceptualization of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Relevancy of Ibn Khaldun (1992)," reprinted in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4.

註 23 Hay, *Political Analysis*, pp. 35, 59-65;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2;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27-228.

註 24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

註 25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註 26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p. 445-446.

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係構成國際關係理論的能動者／結構議題，它基本上是本體論的爭議。Harry D. Gould 曾主張：「〔能動者／結構的爭議〕主要為方法論上的辯論，一定程度上是本體論的辯論，但與認識論無關。」²⁷ 本文認為本體論既為「研究之始」，具優先性，如果置換 Gould 句中方法論與本體論所放的位置，該陳述可說是完全正確。Wight 亦認為：許多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議題乃是因為不同理論為處理本體論上的爭論所「意外產生」的。因此，所有試圖純以認識論（此點乃特別針對 Wendt）與／或方法論的角度來瞭解能動者／結構問題都必然會失敗，因此要全面地處理能動者／結構問題只有從本體論的層次著手，再進而從「解開各種國際關係理論對國際政治基本要素不同的概念化方式，以助於我們評估這些理論的效度與實徵主張。」²⁸

誠如本文前言所述，在國際關係的理論化過程中，Waltz 認為：以單元的屬性與互動來瞭解整體的簡化論是不足取的，而結構現實主義轉而強調「體系的結構概念，這使得國際政治學者的研究範疇有所區別，並可讓他們瞭解體系的結構及其變化會影響到互動的單元以及它們所產製的結果。」²⁹ 但建構主義者則認為：Waltz 對能動者／結構的概念是有問題的，因此，「儘管 Waltz 聲稱是結構主義，但他最終還是個體主義者。」³⁰ 而建構主義則要進行「概念性的重組」，以建立一個「在類型與內容上與〔結構現實主義〕迥異的結構性理論。」³¹ 也因此，建構主義在能動者／結構議題上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判，並非在全盤否定結構性論理，而是希望能藉此建構出一個更好的結構性理論。³² 由於國際關係中大部分的建構主義論述均以批判結構現實主義為始，而理解建構主義者所謂「類型與內容上迥異的結構性理論」究何所指，當為建構主義研究之起點。

對於老問題的越辯越明，往往是科學性的知識累積與進步的途徑。而且，固然不同的理論各有內在不同的本體論立場，這意謂能動者／結構問題不見得會有終極與明確的答案，但這不表示此一問題沒有價值。在國際關係理論化過程中，各種理論主張

註 27 Gould,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 83.

註 28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

註 29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1990)," reprinted in Waltz,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74. Waltz (或 Wendt 等人) 所稱的簡化論即為「個體論」(individualism)，乃「強調個體，而非社會整體。故後者必須以其成員的角度加以理解。」在此意義下，個體論為整體論的反義詞。見：Trigg,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p. 210. Waltz 與 Wendt 使用簡化論一詞，有時指本體論上結構主義之反義，有時指方法論上整體論之反義。為對應與區別計，本文於本體論時稱個體主義（反義為結構主義），方法論時稱個體論（反義為整體論）。以方法論言，整體論與個體論之區別在「解釋的來源」的不同，Wendt 即指出方法論上的個體論主張「社會科學的解釋應當簡化為獨立存在的個體之屬性或互動。」見：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6.

註 30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5. 另見：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 449; Alexander L.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1, No. 3 (1987), p. 341.

註 31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5.

註 32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2.

百花齊放，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窮盡探討各理論的深層假設，當可增進我們各該理論的認識，也有助於瞭解各不同理論主張內在深藏的核心差異。Ruggie 曾謂「建構主義最獨特的部分，在於其本體論領域，也就是任何理論所假設的與其解釋所提出之真實世界的現象。」³³中國學者秦亞青也點出能動者／結構議題是「建構主義進入國際關係領域的第一個突破口。」³⁴這些提醒我們：當建構主義與其對結構現實主義的爭論幾成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之主要焦點的當今，尤值得我們追問：兩理論在本體論上有關能動者／結構議題的核心差異何在？這些差異對兩者的理論主張有何影響？

參、能動者／結構議題所涉的相關概念

能動者／結構的議題圍繞在能動者、結構與兩者間關係三個概念上，主要的爭點為後兩者。就能動者言，建構主義的流派雖多，但基本上「說某一事實『被建構』，指其之所以為事實乃取決於人類的特定行動。」換言之，建構主義對於現實的認定具有強烈的「人類取決性」，甚至「如果沒有人類能動者持續的存在與適當的作為，事實將不復存在。」³⁵誠如社會學家 Michael Crotty 為建構主義所下的定義：

建構主義乃指所有的知識——也就是有意義的現實——均視人類的實踐而定，由人類與他們的世界內外互動所建構，並在社會性的網絡內發展與散播。³⁶

人類取決性提供建構主義者開啓能動者與其能動性等概念的鑰匙。由於有人類取決性，現實並非既定，其意義由人類的實踐所賦予。人類之行動並非單純以個體行之，而是以社會人為之，這個社會人具有社會性的身分所賦予的權力（或義務），能讓他去作某些事（或不去作某些事）。此一社會人——如 Giddens 所主張——是有能力且具知識的，前者指行為者有能力採取不同的行動，後者指行為者清楚所處的社會狀態以及在此狀態下行動的條件。³⁷能動者是個體或單元，但對建構主義者而言，只有社會

註³³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p. 239.

註³⁴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年3月），頁4。

註³⁵ Kukla,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p. 19, 21.

註³⁶ Michael Crotty,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Meaning and Perspectiv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London: SAGE, 1998), p. 42. 國際關係研究者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等人亦認為建構主義者乃在主張「社會政治世界由人類的實踐所建構，並試圖解釋此一建構作用如何發生。」與 Crotty 所主張可說如出一轍，見：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Constructing Constructivism," in Kubalkova, Onuf, and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 20.

註³⁷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1999]), pp. 281-282.

建構關係中「被建構」的主動參與者始具有完全的能動者概念指涉，³⁸亦即「能動者即為或包含那些他們的行動可社會性地或物質性地影響世界之個體。」³⁹因而，就建構主義者而言，能動性也不僅止於針對不同行為選項以及利益、身分或決策程序等等「加以詮釋與選擇的能力與權力」，⁴⁰而是如 Bhaskar 所認為的是足能針對世界施加影響之「有意的轉型性實踐」。⁴¹以 Alex Callinicos 更明白的講法，在相互衝突的歷史結構下，作為能動者的人類不僅止於扮演「承載者」而已。歷史結構固然會對人類實踐構成障礙，但人類會試圖去克服這些障礙，並有意識地評估自己的行動，以去控制社會世界，以實現所欲的未來，以「創造歷史」。⁴²

為研究方便計，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家（包括非建構主義者）常工具性地將國家予以「擬人化」。⁴³而為了要把結構化理論應用到國家／國際體系的層次，Wendt 不僅視「國家可被認為是目標導向的行動單元，在此界定下可被視為能動者：」⁴⁴並更進一步謂「各個國家就是各個個體的組合，藉由他們的實踐，彼此構成具有利益、恐懼等等『個人』。」⁴⁵Wendt 藉由將國家巡視為個人，而非單單「擬人化」而已，使國家的活動與人類理性地追求其所欲的活動便可視為同一，以與 Giddens 的社會人概念接軌。⁴⁶此一論點引來不少批評，有認為建構主義者並不需要背書此一國家核心論立場；⁴⁷有抨擊未見 Wendt 對國家理論有何著墨，便巡視國家為能動者；⁴⁸有拿對原本針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評，認為 Wendt 也忽略了非國家行為者的存在與作用。⁴⁹面對種種批評，Wendt 對此的辯護與 Waltz 有幾分相似，依舊堅持基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學科邊界不應有所混淆，將國家巡視為個人有其必要。⁵⁰

註 38 而且視能動者的地位、職務與角色，同一能動者也可能同時具有多重的能動性。見：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Kubalkova, Onuf, and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p. 59, 72.

註 39 Gould,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 81. Bhaskar 亦認為：能動者，簡單地說，即是有能力在他者或己身帶來改變之個體。見：Roy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Brighton: Harvester, 1978), p. 109.

註 40 Gil Friedman and Harvey Starr,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Ontology to Empir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11.

註 41 Roy Bhaskar,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1993 [2008]), p. 393.

註 42 Alex Callinicos,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12.

註 43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80–187.

註 44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p. 359.

註 45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p. 397, fn.21.

註 46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87–189.

註 47 如：Hurd, "Constructivism," p. 306.

註 48 如：Hidemi Suganami, "Wendt, IR, and Philosophy: A Critique," in Guzzini and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3–64.

註 49 如：Andreas Behnke, "Grand Theory in the Age of Its Impossibility: Contemplations on Alexander Wendt," in Guzzini and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55.

註 50 Alexander L.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Guzzini and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06–207.

結構既為人類所建構，Bhaskar 與 Giddens 等人從能動者之能動性的角度上突出了結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具有轉型的可能，人類也不單純是結構的人質，而具有從其中「解放」的潛能。^{註51}如同下文所將敘述，能轉型結構與解放能動者的能動性，成為國際關係領域中的建構主義一大特色，也是 Wendt 引以提出「無政府是國家們所創造出來的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de of it)」名言之論理背景，形成建構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重大區別之一。

對於能動性的強調，鋪陳了建構主義者對結構闡述的先行基礎。結構，是許多社會學理論及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但不是所有的理論都同意結構在本體論上的存在與方法論上的解釋力：^{註52}本體論上的個體主義不認為有結構的存在，結構僅為個別行為的總和，是「持續一定期間之行為總和的模式」。而方法論上的個體論，則認為結構可以化約由個體行為加以解釋；「結構效應」不過指涉「一群個體」的影響力，可以由「集體效應」加以取代，結構並不具有自變項的解釋力。^{註53}

在進一步論述前，必須先加以區別本體論上的個體主義者與方法論上的個體論者。根據 Wight 的區分，一個本體論上採個體主義立場的研究者（如前段所述），因為認為只存在個體的社會實體，故在方法論上一定從個體論見解，亦即採取個體的模式進行社會實體的解釋。但在方法論上從個體論見解的，不必然會在本體論上採個體主義的立場；許多研究者並不否認整體的存在，但他們可能基於方法論上的標準，而認為從個體的角度所獲致的解釋較為適當。同樣的，本體論上採結構主義立場的，必然在方法論上選擇整體論；而方法論上採整體論者，有可能並不同意本體論上的結構主義。^{註54}

在社會學中，對於結構以及結構與能動者關係的討論很難不以 Max Weber 與 Emile Durkheim 兩位社會學家相對立的概念為始。就 Weber 言，固承認社會生活不僅止於個體，但他認為這可化約以個體的屬性予以解釋，對於群體的解釋必須奠基於相關個體的瞭解。因此，如同前段對個體主義／個體論判別的敘述，可以認為：Weber 雖不是本體論上的個體主義者，但卻是方法論上個體論者。^{註55}

而 Durkheim 持本體論上的結構主義，認為個體乃社會條件的結果。社會不僅是個體的總和，社會本身即為一個實體，它無法被簡化為個體的心理或行為；「甚至看起來是非常個人的舉動，也是由社會整體所呈現出之超乎個人的法則或力量的作用來加以解釋。」^{註56}社會由超乎社會內成員之外的社會事實所構成。社會事實既為「一個團體所

註51 Mark J. Smith,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1998), p. 306.

註52 例如，「國家不會行動，而是它們的領導人們在行動，在特定狀況下相關的決策者們實際上便是國家」之類的論點便是國際關係領域內標準的個體主義見解。見：Pa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75 [1981]), p. 42.

註53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7-128.

註54 因此，Wight 再次強調「科學實存論者對於以方法論上的答案去回答本體論上的問題是抱持懷疑的態度。」見：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7.

註55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4.

註56 Brian Fa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Multicultural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1997 [1999]), p. 51.

集體接受的信念、趨勢或實踐」；⁵⁷也是社會或社會體制對個體所施加的影響力或限制。社會事實有其自身的存在，與個別成員、其心理狀態與其生物特徵有別。社會事實連結起一個整體的社會體系內的因果關係，其改變，乃是由於另一個社會事實，而非社會內任一個體有意識的行動所造成。⁵⁸

Durkheim 也不同意 Weber 方法論上個體論的看法，並主張任何從個體觀點出發的理論都無法成功地掌握到社會現象的特定屬性。⁵⁹一個社會事實只能以其他的社會事實——而非在個體層次的過程或現象——來加以解釋。所謂「其他的社會事實」與被解釋的社會事實起「相伴變化」，而這種變化關係可以覆蓋律形態表示。⁶⁰因此，Durkheim 的觀點是本體論上的結構主義與方法論上的整體論；在此概念下，結構為「控制社會事實之行為的法則般規律性」，社會事實可以對個體施予外在的限制，它們彼此間存在有法則般的規律性。⁶¹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國際政治經濟學者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論是結構主義與整體論的典型，他主張：對國際政治體系的特定權力（或能力）配布的解释必須參照當時的經濟秩序。並認為：社會科學家的根本分析單元是社會體系，並主張社會體系決定、形塑並創造其組成單元，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主要社會體制如國家、階級、民族、家庭都是由當下運作中的世界經濟體所形塑（甚至於創造），透過此一結構，主權國家得以被正當化與加以約制。⁶²

而建構主義者則在 Durkheim 結構主義與整體論的基礎上提出二種強調能動性的修正意見。

第一種修正意見，取自社會學家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的辯證關係觀點。根據他們的觀點，人類與所處的社會是互動的三階段——社會是人類的產物、社會是客體的實體與人類是社會的產物——辯證過程。社會是人類行動透過知識或象徵的實際作用客體化而成，是人類的外在化。客體化與外在化是持續性辯證過程中的一段，社會作為產物會回過來作用到製造者人類身上，透過社會化來形塑人類，因此人類為社會的內在化。社會不能脫離產製它的人類活動而取得本體論上的地位；而人類

註 57 Stephen Lukes,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p. 54.

註 58 Fa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 51.

註 59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30.

註 60 Ted Benton and Ian Craib,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ough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 26.

註 61 Claude Levi-Strauss 則從語言學的觀點提出結構主義的現代版本：語言作為符號的系統，其意義與規則並非由個別使用者或其互動而來，「有意識的能動者並不創造他們所處的意義系統，而是他們作為社會主體，乃是由此一系統所創造，並處於其中。」見：Fa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 51. 除了結構（語言）先存於單元（個體使用者）概念外，Levi-Strauss 也強調結構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指出：任何社會科學家必須關注「語言作為系統的存在，而非個體的思想或行動。」見：Trigg,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p. 198.

註 6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s a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 Viotti and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25–236.

的活動亦同。^{註53}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的主要附從與增修者以 Margaret Archer 與 Walter Carlsnaes 為代表，兩人均引進結構形態的概念，作為方法論分析上的工具，來處理前述的辯證循環關係。他們認為：結構在邏輯上先於行動，行動可以轉型結構，而進一步製成的結構後於行動。除此，並增修 Berger and Luckmann 的原始觀點，給了能動者／結構的辯證關係時序的概念：要解釋能動者在特定時點的行動，必須考慮到該時點的結構、能動者在該時點之前的行動，以及這些行動的結構效果，還有它們之前的結構等等。^{註54}儘管在實際的分析上，他們的模式仍然需要賦予特定之時間關係上的依托，以決定分析起始的時間點。但相對於其他建構主義者，他們的論點距離實證主義的傳統比較不那麼遙遠，似乎因此獲得較多非建構主義者的認同。^{註55}

建構主義第二種修正意見則以 Bhaskar 與 Giddens 為代表，認為能動者的能動性與結構兩者並非兩相對立的，而是互動的，「結構為行動背書，而行動時而強化、時而減耗給予行動權限的結構。因此，結構使行動成為可能，而行動產製與再產製結構。」^{註56}在此意義下，社會結構是社會互動的條件與結果，是各社會行為者彼此在互動時所憑藉的規則與資源。^{註57}而 Giddens 的結構雙元性即指「社會結構不僅為人類能動性所建構，而且同時也是此一建構的基本媒介。」^{註58}同樣的，Bhaskar 亦認為結構是無時不在的條件，是人類能動性對之不斷地再產製的結果。他主張：人類（能動者）與社會（結構）必須區別。社會並非由人類所創造，因為社會先於人類，也是人類行動的必要條件。社會為個體再產製或轉型之結構、實際作用、習俗的集合，而且只有在個體的行動才會存在。社會不獨立存在於人類的行動之外，也不是人類的產出。取得與維持因應特定社會系絡所認可的或再產製且／或轉型社會所需之相關技巧、才能、習慣的過程，即為社會化。而再產製且／或轉型社會——儘管常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達成——都是能動者運用相當技巧的成就，而非只是由先例條件的機械式反應。因此，

註53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1966 [1991]), pp. 78–79.

註54 Carlsnaes,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p. 259, 264.

註55 例如：Friedman and Starr,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7–28.

註56 Fa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 65.

註57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 185. Bhaskar 亦作同樣主張，例如：「社會結構的存在是任何人類活動的必要條件，社會提供了我們所有行動的方法、媒介、規則與資源。」見：Roy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1989), pp. 3–4.

註58 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 121. 以語言為例，語言的結構特性是其文法，行為者依照文法造句，但也正因行為者依文法進行造句的舉動，使得此一語言特性變得更加鞏固。結構「使之可能」也「對之限制」，如同文法，結構使行動成為可能，也限制了一些可能的行動選項。結構一方面建構行動，而且同時也被行動所再產製。見：Blaikie,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pp. 72–73;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1), p. 19.

社會提供人類有意欲的行動之必要條件；而人類有意欲的行動也是社會的必要條件。社會只存在於人類的行動中；而人類的行動必然會表達或使用若干社會形態。但是，〔社會與人類〕任一者不能被誤認為另一者，不可被化約成另一者，不能被以另一者來解釋。^{註⑩}

既然社會與人類不能被誤認、化約成另一者，結構化理論論者與 Berger and Luckmann 之辯證關係觀點的最大差異因之呈現：對於後者，能動者與結構是「同一過程內的兩個時點」，能動者與結構並無本體論上的獨立性；但對於 Bhaskar 與 Giddens 而言，能動者與結構則是「根本不同類型的事物」，^{註⑪}由於結構的屬性與能動者的屬性不同，他們在本體論上是彼此獨立的，但也是互動的、相互依賴的、相互建構的。

Bhaskar 把 Weber、Durkheim、Berger and Luckmann 與他自己的看法等四類不同能動者／結構見解予以模式圖解（見圖 1）：Weber 的論點呈現於模式一，代表著社會是人類蓄意或有意義的行為之結果；Durkheim 的論點則呈現於模式二，代表著社會具有自身的存在，外在於並強制在個體上。為解決模式一、二所形成的兩個極端，Berger and Luckmann 主張的能動者／結構持續辯證的關係觀點呈現於模式三。在此關係下，社會創造可以創造社會的個體。社會是人類的外在化，人類是社會的內在化。Bhaskar 的觀點呈現於模式四，對他來講，前三者的缺點在於：「模式一有〔人類〕行動，但卻沒有〔社會〕條件。模式二有條件，但沒有行動。模式三則〔對人類與社會兩者〕沒有加以區別。」^{註⑫}

Bhaskar 與 Giddens 也主張結構在本體論上的先存，認為結構在本體論上先於能動者存在，這是他們與個體主義者的區別；但 Bhaskar 與 Giddens 並不主張結構決定論，這是他們的論點與結構主義者的區別；Bhaskar 與 Giddens 認為能動者與結構彼此均為本體論上的獨立主體，這是他們與 Berger and Luckmann 的辯證關係論點的區別。

這些本體論上的概念結合了實存論的觀點後，延伸出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意涵。Bhaskar 的實存論將事物分成實徵的、實際的與實存的（empirical-actual-real）等三個由淺至深的領域區別，在最淺的實徵領域包含了可加以觀察的事件，而實際的領域包含了所有可以與無法加以觀察的事件，而最深的實存領域則是產製這些事件的深層結構與機制。^{註⑬}實存論者並不反對實徵主義，儘管實徵主義無法徹底瞭解事物的全貌，但畢竟仍是任何認識論的重要元素。^{註⑭}知識不全依賴經驗與感知，實存論者不滿足於實徵領域的研究，他們要超越「可觀察之經驗的表面層次」以進行更深的挖掘，試圖找到社會存在的深層是如何運作的，找出「與某特定狀況相關之結構性關係、啟動結構

註⑩ 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1979 [1998]), pp. 34–37.

註⑪ 引文見：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p. 452, fn. 45.

註⑫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pp. 31–33, 37.

註⑬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p. 56.

註⑭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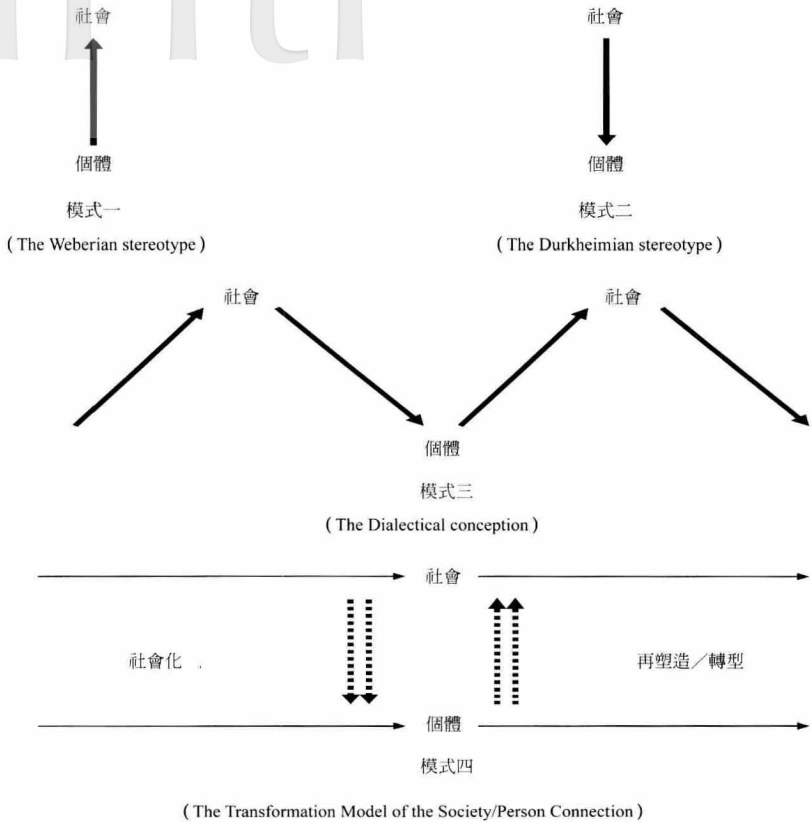


圖 1 四種能動者／結構模式

資料來源：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1979 [1998]), pp. 32, 36.

的條件以及產製事件的機制。」^{註 74}換言之，實存論者關切哪一類型的事物存在、它們如何運行，即便它們無法加以觀察，此一實存本身獨立於科學家的活動。^{註 75}對於實存論者，理論中所敘述的實體——包括結構——是實存的，而科學則在發現其運作。^{註 76}

註 74 Smith,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p. 319.

註 75 Roy Bhaskar,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1986), p. 5.

註 76 Blaikie,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p. 58.

此一獨特的本體論立場使得科學實存論在認識論上的看法大抵是質疑（但非反對）實證主義的。⁷⁷因而，在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者，基本上也對實證主義採取質疑的立場，認為社會關係並無法清楚區分因與果，所謂社會的法則也非自然與客觀地存在，而是視情況而定（contingent，見下敘）。⁷⁸而 Wendt 雖高舉科學實存論的旗幟，但比較獨特的是，他並不願全面地向國際關係領域內主流的實證主義挑戰，而是一再強調要在科學實存論與實證主義間兩者間建立一個「中間道路」（via media）。⁷⁹對此，被批評建構主義陣營中的 Stefano Guzzini 和 Anna Leander 諷刺此為：Wendt 藉與傳統派理論整合，以暗渡其建構主義異端派論點的另一論述技巧，因為 Wendt 所指的實證主義跟國際關係學科裡所共知的實證主義根本是兩回事。如果依 Wendt 所謂的實證主義途徑走下去，最後將是「國際關係的無實證社會科學」。⁸⁰而支持建構主義陣營的 Wight 對 Wendt 此舉也持保留態度，認為：Wendt 所主張的中間道路雖非不可能，但實無必要。因為 Bhaskar 等實存論者主張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具有共通的原則，但由於兩者的研究對象不同，程序也有所不同。「人文科學『從相同的道理上』也可以是科學：儘管它們與自然科學『並非採用相同方法』。」因此，社會現象雖不能像自然現象以同樣的方法加以研究，但仍無損於以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基於此，Wight 認為：所謂實存論者質疑實證主義，是在反對實證主義作為科學研究的唯一途徑與方法的論點，實存論鼓勵多元，在超越實證主義，因此並無認識論上的基本差異而需要 Wendt 另提中間道路來加以收平的。⁸¹

實存論者對於因果性的關注不在兩個不同事件（因與果）的關係，而是對解釋的事物或關係「行動的方式」或是因果機制的描述；實存論者對因果性的觀點「並非指不同事物或事件間的規律性，而是關於被解釋的事像什麼、它能夠作什麼與延伸出來的它在特定狀態下會作什麼。」⁸²國際關係學者 Bill McSweeney 解釋這種建構效果：如果沒有話語（語言行動）我們無法知道語言（結構），語言的存在在於話語的使用，

註 77 科學實存論者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法則不必然具有普遍性，批判實證主義者（特別是以覆蓋律的形式）把因果性視為事件間普遍性的連結。見：Blaikie,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p. 61. 另一方面，也質疑實證主義的因果性概念中的因果機制是虛擬的，只是分析上的用來作為測量或觀察兩個「變數」在值上的變化。對實存論者，因果機制的概念是本體論上的，是真實的社會控制或形構過程，也堪為研究課題。例如：Wight 批評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等人視因果性僅為理論上的概念，而非真實的作用力。並認為後者視因果效力不過為可觀察的兩變數所賦予之值產生變化。他們假設因果機制存在於因果之間，於是形成先有因、再有因果機制，最後才是果的印象，因之常常造成（包括前述三位作者）的誤解，反而認為是「因果機制產生果」。見：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1–85;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1–35.

註 78 例如：Hurd, "Constructivism," p. 307; Viotti and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96.

註 79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9–40.

註 80 Guzzini and Leander, "Wendt's Constructivism," pp. 79–80.

註 81 分見：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pp. 203, 26–27;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7, 243–254.

註 82 Andrew Sayer,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1984 [1992]), p. 105.

但這並非指話語爲因，語言爲果，兩者關係的核心並非孰因孰果。⁸³這也是 Wendt 在因果關係外，特別強調建構效果背景，Wendt 也指出因果關係的缺陷在於其意涵著因與果（即自變項與依變項）各自獨立存在而且因先於果。⁸⁴

總的來說，國際關係內的建構主義者多認爲結構與能動者的能动性是相互建構，因此在本體論上彼此互爲先決條件。一方面，國際結構提供某些資源以使國家行動有所可能，也形成某些規範來制約國家行動，而另一方面，結構是「透過」國家的互動所產製與再產製，而不同於「結構『是』國家互動所形成」的個體主義的觀點，因爲在後一命題，結構會被簡化爲個體的屬性（見下文第肆節所敘）。而相互主體性產生於國家與國際體系之產製與建構的過程中，以 Dessler 的看法爲例：

國際結構理論可以這樣認爲：國家的行動唯有實現該行動所憑藉的工具存在始有可能與可知。行動必然需要兩類的工具或媒介：首先，民族國家必須有資源，包含能力在內的物質屬性。……其次，民族國家也必須有存在的規範，以作爲彼此間溝通與協調行動所賴的媒介。政策不僅依賴物質能力；同時也需要意義架構，如此，能力的使用才有可能被認爲是政策（也就是有意欲與有意義的行爲），如此，這些意欲的意義成爲國家互動的模式基礎。⁸⁵

從前引文中，可看出 Dessler 鮮明地引進 Bhaskar 與 Giddens 之結構作爲規則與資源的見解。不過，值得一提的，儘管國際關係中之建構主義者大量汲取 Bhaskar 與 Giddens 的見解，也直接或間接地把結構界定爲規則與資源——也就是 Dessler 在前引文中所稱的「物質能力」與「意義架構」，⁸⁶而 Wendt 在論述上卻明顯地偏重於規則（即「意義架構」）上，也刻意提出唯心主義，並強調其與結構現實主義之唯物主義的對立，此即爲本文前言所提建構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在本體論上除能動者／結構外的第一項爭點（非本文範圍）之背景。

肆、建構主義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判

在能動者／結構的議題上，建構主義者對 Waltz 的批評出於以下兩個面向：第一，Waltz 自稱的結構現實主義，實乃個體主義；第二，就算 Waltz 是個結構主義者，也忽略了能動者能动性轉型結構的可能。

註 83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9.

註 84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9-88.

註 85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p. 453-454.

註 86 其他持相似觀點者，可見：Nicholas Greenwood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pp. 23-30; Alexander Wednt,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 390.

就第一個面向上的批評，建構主義者認為：Waltz 在本體論立場的論述上，主張單元在本體論上的優先與先存於結構，所以 Waltz 其實還是個體主義者，而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本體論立場就是該理論所力主反對的個體主義。⁸⁷辨明此一問題的核心在於：Waltz 是否做出單元在本體論上優先與先存的主張以及前項主張是否為結構主義與個體主義判別的標準。因此，瞭解 Waltz 的相關論點當為首要，Waltz 的原始論點大抵呈現在他《國際政治理論》第五章「政治結構」中，為論述與比較方便計，作者將文本中分散於該章各段落之重要論點重新予以組合後，整理為下列數點：

- 一、國家是「單元」：國際體系由國家單元所構成，國家在屬性上是相似的（如均為具主權的政治實體組織與均追求自身利益及安全的功能），其主要的差異在於彼此的能力不同。⁸⁸
- 二、結構的「形成」：各個國家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行動，並在國家間的互動中，自然形成結構。Waltz 向以市場機制比擬成國際結構，並以此展開論述：

國際政治體系——如同經濟上的市場機制——是由重視自我利益單元的共同行動所組成。……國際政治體系，也像市場機制，其根源是個體主義的，它是自發與非刻意下所形成。市場機制產生於分散單元（個人或公司）的活動，這些單元的目標與努力並非要建立秩序，而是以其可運用的手段來實現其自己定下的利益。個別單元為自己而行動。從同類單元的共同行動中，形成會影響並制約它們的結構。⁸⁹

- 三、結構的「屬性」：Waltz 認為：國際間的「關係」可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但他再三強調互動不在國際結構的定義之內。另一種是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所據有之位置，結構的屬性為後者，為「單元如何與其他單元並處的相對關係——也就是單元被安排與定位的方式，……才是結構的屬性。」此種國際結構的屬性有二：一為國家間的安排方式，也就是自助的無政府原則。次為國家間的能力配布。⁹⁰
- 四、結構的「效應」：國際結構會影響並制約國家的動機、行動與國家間的互動，只要國際結構存在，就會對產生相似（不一定相同）的國家行動與國家間互動過程，結構是成因，雖然不是唯一的成因，但結構的效應卻是「一股由單一或少數〔國家〕所無法加以控制的力量。」⁹¹
- 五、結構的「變化」：國際體系屬性既為國家間的安排方式與能力配布，兩者產生的變化即為結構的變化；國際體系之屬性產生變化，就會使得國家行為與國家互動結

註 87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p. 341.

註 88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5-96.

註 89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0-91.

註 90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9-81, 89-91, 98.

註 91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7-90.

果產生變化。⁹²

建構主義批評 Waltz 為個體主義者，多由 Waltz 前述第二項論點為始，例如 Richard K. Ashley 批評 Waltz 所指的國際結構「並非是一個深層與內在的關係，並非是先存於且構成社會行為者的關係。」結構現實主義者既視國際體系的結構由國家所產製，主張國家在本體論上先存於國際體系，顯與一般所認知的社會學上結構主義者的觀點有很大差異。⁹³ Dessler 也指出：Waltz 的觀點乃國家單元產生互動，再由國家互動啟動結構。此乃國家先於國際體系結構，為單元先存於結構的個體主義。⁹⁴

Wendt 更進一步指出有關能動者／結構問題視是否給予結構或單元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而定：把結構簡化為單元，為個體主義者；把單元簡化為結構，為結構主義者；視結構與單元均具本體論上地位，為結構化論者。如同本文第參節中所述，Wendt 也對本體論上的結構主義／個體主義與方法論上（以 Wendt 用語為「解釋上的」）的整體論／個體論做出區別，認為 Waltz 強調體系結構具有因果解釋上的重要性，這固然是方法論上（或解釋上）的整體論。但對 Wendt 而言，更重要的是 Waltz 卻同時也是個本體論上的個體主義者。Wendt 認為：Waltz 前述第三項論點主張單元屬性（國家互動）形構結構屬性（國家被安排與定位的方式），亦即結構屬性由單元屬性所定義。對 Wendt 而言，這就是把結構化約為單元。而 Wendt 也認為：由前述 Waltz 第四項的結構效應論點反推，Waltz 對結構的定義讓人認為結構只會「制約」國家的能動性，而非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一般，結構會「生成」國家能動者本身。Wendt 認為：「這必然是基於對本體論上〔個體主義之〕定義而來的。如果體系結構一開始就被化約為能動者，無怪乎體系結構不能生成能動者。」⁹⁵

另外，Martha Finnemore 則以能動者及其屬性在分析上視為既定，而結構則來自能動者互動者，視為個體主義；以社會結構視為既定，而從能動者所處的社會體系中界定能動者及其屬性者，視為結構主義者。在此標準下，她批評 Waltz 言下的結構「不過是組成國家的喜好與權力下的附帶現象，它沒有獨立之本體論上的地位。更進一步說，它並非可生成的，它不但不會創造與組建行為者與利益，反而是由行為者與利益所組建。」⁹⁶

在這些對 Waltz 的批評中，比較不具爭議的是 Waltz 在方法論上為整體論的看法。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在方法論上以國際結構作為解釋來源，以結構解釋國際現象，在方法論上應為整體論者，而 Wendt 對此亦無爭論，並稱此為解釋上的整體論。進一步言，對於 Waltz 而言，國際體系內的能力配佈即為 Durkheim 所稱的社會事實（社會或社會體制加諸於個體的外在限制），Waltz 以之來解釋體系內的變化，即以體系極化程

註⁹²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0–81, 97–98.

註⁹³ 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71.

註⁹⁴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p. 449–450.

註⁹⁵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pp. 339–342.

註⁹⁶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4.

度解釋體系穩定的論點獲得對應。⁹⁷在方法論上可以說完全呼應 Durkheim 在整體論上的見解。

具爭議者為本體論上的問題。綜整前述對 Waltz 本體論上的批評，可知建構主義者認定 Waltz 非結構主義者的三項主要的評判指標，包括：本體論上（1）結構是否具有獨立的地位；（2）結構是否先存於單元；以及（3）結構是否能生成單元。而其中以第（2）點是最廣被建構主義者用來抨擊 Waltz 的重點。

對於第（1）點結構在本體上的地位，結構主義者主張結構具有獨立於單元之外的自主性存在，在這點上，Waltz 屢屢強調「任何途徑或理論如果能被稱之為『體系的』，就必須指出體系層次或是結構並不同於互動的單元層次。」⁹⁸儘管 Dessler 認為 Waltz 對結構的界定過於狹隘，並舉出像北約組織此類的聯盟並非如 Waltz 所認知的只是個體層次的互動，而是互動的產製物，是結構。⁹⁹但難以否認的是，結構與單元在 Waltz 的概念中並非沒有加以切割。

對於被批評最多的第（2）點結構先存的問題，Waltz 並不接受批評者的意見，Waltz 稍後曾對他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前述五項原始論點做出若干補充說明，例如，為了擺脫外界將他歸類為結構決定論者，Waltz 就針對原來第（四）項有關結構效應的部分，做了許多略往單元層次傾斜的補充（見下文第（四⁺）點所敘）。但 Waltz 對於必須同意本體論上「結構先存於單元」的主張始堪稱為結構主義者的論點，卻表現得寸土不讓。事實上，Waltz 的不同意也並非全無依據，因為若以此（結構須先存於單元）方式作為對結構主義的界定，則恐怕連 Durkheim 也必須被排除在結構主義者之外。例如，這是 Durkheim 廣被引證其為結構主義者的一段話：

當某些元素結合並因其結合之事實而產製新的現象；很清楚的，這些新的現象並不再屬於原來的元素，而是屬於由這些元素之組合所形成的整體。¹⁰⁰

以 Waltz 在前述的第（二）點有關結構形成的論點來與 Durkheim 的引文對照比較，兩者間是相容的。¹⁰¹

第（3）點有關結構生成單元的主張可說是門檻最高的標準，Wendt 認為真正的結構主義者應當主張結構會生成單元，並以結構的屬性來解釋單元的行為與屬性。¹⁰²

註⁹⁷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8; also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1964)," reprinted in Waltz,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9–122.

註⁹⁸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40.

註⁹⁹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Agent-Structure Debate?" p. 462.

註¹⁰⁰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lated by Sarah A. Solovay and John H. Mueller, edited by E. G. Catlin (New York: Free Press, 1895 [1938]), p. xlvi.

註¹⁰¹ Waltz 指出：說誰是 Durkheim 的忠實信徒並不重要，而是必須找出理論上最站得住腳的且實務上最有用之結構定義。對於 Ashley 所主張結構先存於單元——亦即權力平衡的機制（結構）產製主權國家（單元）的觀點，Waltz 毫不諱言地指出：權力平衡機制早於會進行制衡動作之國家單元的說法，實令人困惑。見：Waltz, "Reflection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8, 49.

註¹⁰²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6, 28–29.

Ashley 甚至認為：除了單元由結構所生成外，結構主義者應當主張單元不具有本體論上之獨立存在的地位。^④當「生成」與「先存」兩者結合，Ashley 等人的結構主義的界定實與結構決定論無異。對 Waltz 而言，從其第（二）與（四）點論點，國際結構影響國家單元的行為，但國際結構既由國家單元互動形成，國際結構對國家的屬性（即國家之組成）當不生影響。而 Ashley 等人仍強調以結構必須都能影響單元的行為與屬性，顯然是以結構決定論的標準來判定 Waltz 的本體論立場不是結構主義。

綜整而言，就前述三項指標，在第（1）點上，Waltz 與 Ashley 等人的看法並無太大差異；在第（2）點上，Waltz 的主張固然不同於 Ashley 等人的見解，但亦有所本；在第（3）點上，以強烈的結構主義——結構決定論——來檢驗 Waltz 論點，Waltz 確實未符這樣的標準。因此，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雖然與 Durkheim 的結構主義之間存有相當的相似度，但若以第（3）點最嚴格的標準看待，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確實又與 Levi-Strauss 或 Wallerstein 的結構主義有段距離。

針對 Ashley、Dessler 與 Wendt 批評為 Waltz 為簡化論者，本文認為：Waltz 在方法論上是個整體論者，固無疑義；但把 Waltz 說成是本體論上的個體主義者，似乎也過於勉強。如果結構主義有「厚度」(thickness) 的差別，那麼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在本體論上的立場——如同 Wight 公允地評價——可說是「結構主義裡一種『薄弱』(thin) 的形態」。^⑤

除了前述由結構主義角度的三項批判理由外，Waltz 在本體論上對單元能動性的忽略，益發削弱質疑 Waltz 為個體主義者的看法。從前述 Waltz 第（四）點來看，Waltz 認為結構所生的效應是「一股由單一或少數〔國家〕所無法加以控制的力量」。在 Waltz 的見解中，單元的能動性是相當有限的。即便 Waltz 後來所提出了若干修正（見下文的第（四⁺）點），但他對於單元能動性始終未加以重視。因此，稱 Waltz 為個體主義者亦非妥當。

針對建構主義對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第二個面向上的批評，亦即就算 Waltz 是個結構主義者，他所提出的「結構制約單元」的理論主張，也忽略了能動者能動性轉型結構的可能。這個批評也與 Waltz 前述五項論點有關，並可說是前文第參節所述社會學裡結構化理論對結構主義的批判在國際關係領域內的展示。

在《國際政治理論》之後，Waltz 試圖平衡以往他給人的「結構制約單元」之印象，而對前述第（四）點作了許多往單元層次傾斜的補充（稱為第（四⁺）點）。例如，Waltz 謂：單元層次會減損結構的效應，因此，「結構與單元都不能決定結果，兩者彼此影響」，「結構制約行為與結果，但對行為與結果的解釋是不具決定論的，因為單元與結構層次的成因同時都起作用。」^⑥Waltz 不但用語上特別謹慎（避免使用「決定」之類的動詞），也不去否認以單元層次為方法論上解釋來源的可能。Waltz 再三地說明：單元層次的解釋固然是存在的，而不去加以討論乃因為：這是體系理論在發展

註④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pp. 286-287.

註⑤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6.

註⑥ Waltz, "Reflection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1-42.

上所必須要有的「省略」，或是他比較關切那些「少數但重要」且「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的因素與力量。¹⁰⁶

到了 1990 年代，Waltz 不僅用語更軟，也更進一步弱化原有的整體論見解，將結構抑或單元層次解釋的相對重要性問題，從方法論層次推給了由實徵面，由具體研究實務上視情況解決。Waltz 謂：

對於 [結構現實主義者]，結構會緩解國家所產製的結果。如同內在與外在環境的改變，結構與國家也會增加或減少其因果力。不同層次的相對重要性無法被抽象地或絕對地加以回答。因為結構會影響單元就如同單元會影響結構，所以這樣的模糊性不可能獲得解決。有人會認為我這些的講法已經背離了 [結構現實主義]，如果說 [結構現實主義] 就是單元層次或結構層次決定——而非只是影響——結果的話，那我承認我是背離了。¹⁰⁷

這些修正觀點是否代表不再忽略單元層次因素的 Waltz 離建構主義者越來越近了？答案：沒有。距離沒有拉近的原因在於：這是不同空間的問題，建構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在本體論（即結構化理論／結構主義——儘管結構現實主義是薄弱的結構主義類型）上的差異，並沒有因為 Waltz 修正其方法論上整體論的見解而獲得弭平。兩者差異的核心不在於單元（或能動者）因素重不重要，也不在於單元（或能動者）會不會影響結構。對建構主義者而言，關鍵點還是要回到本體論上單元與結構的關係以及兩者相互建構的方式。

就結構的形成與效應（即 Waltz 第（二）、（四）點論點）而言，建構主義與厚實的結構主義（如 Levi-Strauss 或 Wallerstein）於結構在論述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度，也有相當關鍵的差異點。相似處在於兩者都堅實地定位於「社會」的本體論（social ontology）角度，在這樣的定位下，結構「先存」於單元的概念始具有超越 Durkheim（或 Waltz）的論理基礎。

但非建構主義者與薄弱的結構主義者最常提出來批評建構主義的論點之一，就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同義反覆（tautology）的問題，質疑者問：建構主義既主張結構由單元發生，而又講單元又是由結構所產製，到底結構與單元哪一個因、哪一個是果？單元與結構不可能既是另一者的因，也同時是另一者的果。對此一問題，Ken Booth 以比喻的方式說明：

人類社會性並非以雞生蛋或蛋生雞的方式被建構。能動者……一定程度上是結構的「產製物」，但不是結構的「囚犯」。能動者／結構的辯證與雞生蛋或蛋生雞的難題不同。雞是從母雞的蛋形構而來，但自人類社會生成的絕不會是相同方式下的複製品。……用一個不同的比喻，……人類社會是手拉胚而非機器生產的陶瓷，後者是全然的複製，而前者——儘管使用相同的陶

註 106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9; Waltz, "Reflection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43.

註 107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p. 80.

土——則不會是。製陶家有相當的自由可以作點改變。而正是這種自由使得人類社會是手工而非機械的產製物。^⑩

在社會本體論的角度下，能動性不是以單純的個體行之，而是以「社會人」為之，是社會先給了單元身分，是這個身分上所賦予的權力，提供了能動性的物質與理念基礎。建構主義與厚實的結構主義並不去窮極鑽營在原始狀態下未有互動下的個體，而關切於一定社會系絡下的個體間與個體及結構間的相互建構。易言之，特定的國際結構意義不產生於不在結構系絡內的國家，而在於結構系絡內的個體。在此社會的本體論角度下，結構先存於個體的概念就較易被接受與理解。建構主義的主張在於：國家作為能動者，不能先去掉它與特定國際結構的連結後，而僅以單純的個體去看它的能動性。國家之所以為特定國際結構中的能動者，不是它本來就會「是」(is)，從社會本體論上的觀點，這是透過其處於特定國際結構而「取得」(become)的。^⑪

但建構主義與厚實的結構主義的關鍵差異點在於：後者在本體論上認為：先存使得結構對單元的效應是一種結構屬性為因、而單元屬性為果的決定性關係，並延伸出認識論上實證主義覆蓋律的意涵，這是結構決定論。而前者，對這兩項論點都採取否定的態度。對建構主義，受到科學實存論的影響，先存的概念不是拿來說孰因孰果，而是兩個不同的事態的建構關係。Giddens 特別針對結構主義從因果形態來看待結構效應的論點提出批評：

結構性的制約並非如結構社會學者所想像般是不能改變的因果形態，而結構社會學者正是基於此一理解，才會如此強烈地強調結構與制約的聯繫。結構性的制約並非獨立於能動者行為的動機與理由而運作的。舉例而言，不能拿這種制約與像地震摧毀市鎮的效果相提並論，因為在後者的情況下，市鎮居民對所發生的事無從置喙。但在人類的社會關係中，個體能動者是能活動的，他們有意或無意地通過運用各種資源，來左右事件的發生，社會體系的結構屬性並不會以某種類似自然力的方式作用於（或影響於）能動者，以「迫使」他們以特定的方式行動。^⑫

對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者而言，國際結構固然先存於國家單元，但國際結構對於國家的效應不是所謂某種「自然力」的方式。雖然 Wendt 採實證主義（因果關係）與後實證主義（建構效果）併論的獨特立場，但出於對實證主義過度自滿的質疑，使得

註⑩ Ken Booth, *Theory of World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6-217.

註⑪ 此一「是」與「取得」的概念借自：Emanuel Adler,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95-118;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p. 223; Viotti and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77.

註⑫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p. 180-181.

建構主義普遍地強調「視情況而定」的建構效果。¹¹¹「視情況而定」乃「當我們說某一事件視情況而定時，即表示它的發生並非必然，而是在與其他事件間的一整個複雜關係下的一個可能的結果，主張因與果的關係是要比起這種視情況而定需要更多智識上的努力。」¹¹²而且，國際結構不僅限於制約國家的行動，也同時提供了國家行動的媒介：進一步講，在人類與社會的關係中，在國家與國際結構的關係中，「視情況而定」的概念，即視人類或國家的實踐而定，即啟動了建構主義中對人類及國家之能動性的強調。

如同前述 Booth 與 Giddens 的引文，對能動性的強調——甚至於轉型結構的可能，是建構主義與結構主義最大的差異處（涉及 Waltz 第（五）與（四⁺）論點），也是建構主義的特色。Waltz 儘管在方法論上作出朝向單元層次的修正，但在本體論上對於能動者之能動性依舊十分保留。在第（四⁺）論點中，結構對單元的效應固然會受到單元的減耗，而單元也會影響結構。但這並不代表單元會改變結構，Waltz 更明確地反對 Ruggie 把結構屬性的改變當成是結構的轉型。¹¹³但建構主義不同，誠如論者謂，「藉由把能動性的角色帶回進社會秩序再產製過程，建構主義之相互建構的本體論挑戰了所有類型的結構主義。」¹¹⁴相對於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或 Wallerstein 世界體系論般地厚實的結構主義）對能動者／結構關係的靜態描述，國際關係中建構主義由對能動性的強調突顯出能動者／結構關係的動態性。Dessler 批評 Waltz 的「靜態」模式時就說：Waltz 既然講結構是在單元互動中「自發與非刻意下所形成」（規則僅作為行動的固定參數），那與其說結構是單元互動的產出，倒不如說是意外的附加物。但建構主義所主張的轉型模式中，國家作為能動者可以「刻意」運用資源（資源為行動的必要條件）並藉由行動來再產製或轉型結構。在此本體論立場下，國際結構不但非固定不變的，而且與結構主義主張不同，國際結構的轉變可以不是由另一個社會事實（如 Waltz 主張的能力配佈的轉變），而是可以透過系絡內國家的刻意與非刻意行動，在再產製國際結構的過程中，轉變或甚至轉型國際結構。

轉型與靜態本體論兩者間的差異不在一個承認〔結構〕的存在，而另一個則否。……真正的差異在於兩者對於〔結構〕與行動間「關係」的概念化，靜態本體論認為，〔結構〕（如習俗或規範）是行動的固定參數，是非刻意下再產製出來的，以約制行為，來維持此一結構。轉型本體論則認為〔結構〕是行動的物質條件，能動者可加以取用，並可透過可能是有意的行動加以再產製或轉型。¹¹⁵

註 111 Hurd, "Constructivism," p. 307;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p. 240.

註 112 Gavin Kendall and Gary Wickham, *Using Foucault's Methods* (London: SAGE, 1999 [2000]), p. 5.

註 113 Waltz, "Reflection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0-41.

註 114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monk: M.E. Sharpe, 2007), p. 41.

註 115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Agent-Structure Debate?" pp. 460-461. 既然建構主義者視結構為規則與資源，為便利比較並突出重點計，本段引文中均以「結構」替換「規則」。

伍、從「能動者／結構」的爭論到「分析層次」的表陳

分析層次的表陳是能動者／結構爭論必然的產出，也具有教學上的實用價值。更進一步講，誠如 Waltz 謂「複雜性並非與理論對立；反而是，理論本來就是用來處理複雜性的工具」，^⑩一個具一定簡潔度之分析層次的表陳（或甚至模式化）可被認為某一特定理論處理複雜的能動者／結構議題的能力上之指標。對於具有相對複雜性傾向的建構主義而言，要擺脫「尚不足稱為一個『理論』，只能稱為一個『研究方法』或『研究途徑』」的話病，除了與主流的實證主義者就理論的功能與建立進行認識論層次上的延伸爭論外，藉由在本體論層次上分析層次的表陳所呈現出化繁為簡的表現或可減低（雖無法消除）此類的詭難。^⑪

由於討論分析層次難以不對層次做出切割區分，對強調相互主體性的建構主義者而言，他們寧可正面地針對能動者／結構問題進行討論，也不樂見有這樣的區分或以分析層次的討論來加以取代。^⑫何況，強調能動者與結構相互建構的建構主義者，對於哪一個層次的力量比較重要的爭論也不感興趣。^⑬對這些迴避分析層次表陳的見解，本文有二點不同的看法。

首先，有學者主張分析層次不是理論，是一種概念架構，旨在涵蓋所研究現象的「主要特點（包括面向、因素等等）與它們之間所推定的關係。」^⑭在國際關係裡，分析層次常被用以表達特定理論的主要特點與它們之間的關係，但亦有學者認為分析層次之議題主為研究方法或研究設計。誠如本文前言所表，分析層次具有本體論與方法論上的兩層意涵。就本體論的意義，不同的分析層次意味不同的「分析單元」——什麼是吾人所要解釋與瞭解的；在方法論上的意義，不同的分析層次代表不同的「解釋來源」——吾人如何對之加以解釋或瞭解。^⑮就本體論上的意義，儘管在表述的方

註⑩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p. 72.

註⑪ 宋學文，「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及模型建構」，問題與研究（臺北），第47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85。

註⑫ 如：Alexander Wendt, "Levels of Analysis vs Agents and Structur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 181.

註⑬ Hurd, "Constructivism," p. 306.

註⑭ Colin Robson, *Real World Research: A Resource for Social Scientists and Practitioner-Researchers*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150.

註⑮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pp. 203-205.亦有將前者有關本體論的意義暹稱為分析單元，而以分析層次（或稱解釋層次，level of explanation）特指後者在方法論上的意涵。見：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2-103.反對此種區分者，認為分析層次不過「是方法論上，而非本體論上的辯論，它所指涉的是最佳解釋的方式，而非世界實際為何。」見：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203.同樣的，Nicholas Onuf 亦認為：所謂「分析」層次不過是有關「分析」，並不涉及像是「存在層次」（level of being）一類之本體論上的意涵。見：Nicholas G. Onuf, *The Republican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2-205.但作者認為這些批評應出於把分析層次一詞限定於方法論上的界定，亦即排除了分析單元的意涵。

式有所不同，分析層次（也就是分析單元）與前述的能動者／結構問題都在討論同樣一件事：亦即解釋或瞭解社會的單元如何與社會的整體產生關聯。¹²²

其次，分析層次的表陳，不必然對於本體論上或方法論上某一分析層次的背書。雖然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普遍有針對某一分析層次（國際、國家、團體或個人）以提出理論假說與預測，但跨分析層次的表陳，並非不可能，而且對於強調相互建構性的建構主義，尤需一個跨分析層次的表陳來彰顯其在能動者／結構爭論上的立場。同時，難以否認的是，建構主義者固然高舉相互建構性的大旗，雖無（本體論或方法論上）對能動者或結構任一的偏袒，但實際進行研究時，研究者仍不免還是要能動者或結構之間擇一先行分析。¹²³此時，一個合宜的分析層次表陳，不僅有可將艱澀的能動者／結構問題表象化的優勢，有助於教學與瞭解外，更可使研究者在推究相互建構性之際仍能掌握一定的方向感。

分析層次的表陳固然會簡化若干建構主義者珍愛的論點，但就如同理論必然簡化複雜現實一般，簡化不是論理上的罪惡，而是必然，前圖 1 Bhaskar 針對能動者／結構關係的圖解表示，即為一例。建構主義所持的科學實存論既主張「從相同的道理上」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都是科學，建構主義者自然也難以否認理論在簡潔度所呈現的美感——即「以越少的命題解釋越多的現象」——是項值得追求的標準。¹²⁴基於此，本文將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層次表陳如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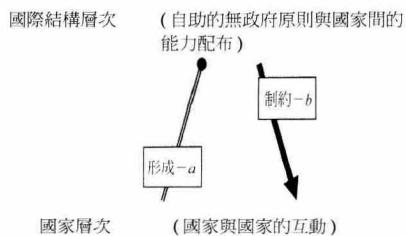


圖 2 Waltz 原始觀點的分析層次表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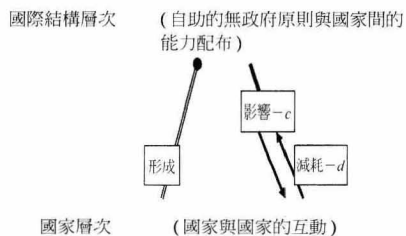


圖 3 Waltz 修正觀點的分析層次表陳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2 顯示 Waltz 的原始論點，國際結構為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所據相對位置的關係，自助無政府的原則與國家間能力配布的狀態為其屬性。結構由國家互動所自然形成，這種形成是自發而非刻意的（即圖 2 中的 *a* 及其非箭頭式的指向），一旦結構形成

註 122 Viotti and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10;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4.

註 123 Friedrich Kratochwil,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in Christian Reus-Smith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10]), p. 456.

註 124 引自：King, Keohane, and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 104.

後，則會對國家層次的國家與國家互動產生制約的結構效應，這種效應為因果關係（即 b 及其具箭頭指向的實心線條）。很明顯地，在 Waltz 的原始觀點中，國家對結構毫無能動性可言。

圖 3 顯示 Waltz 的修正觀點，Waltz 在方法論上降低其整體論的訴求，除用語上改為因果力較低的影響外（即圖 3 中的 c 及其較細的線條），也承認來自國家層次的因素能減耗結構效應的影響。不過，國家的行動固會影響結構的效應，但 Waltz 並不認為國家具有足以影響結構屬性的能動性（即 d 及其箭頭僅止於結構效應所生之影響而未持續上升）。

而本文作者主張：一個建構主義分析層次之表陳必須掌握的要點是 inside-out 與 outside-in 兩相互建構的動態性、系統性、具回饋效果與非純然線性關係，並提出針對建構主義特點之較具綜合性、全面性的分析層次表陳（如圖 4）。綜觀圖 4 的表陳方式，除明顯與視結構為既定的 Waltz 觀點（圖 2、3）不同外，具五項與建構主義相關的表陳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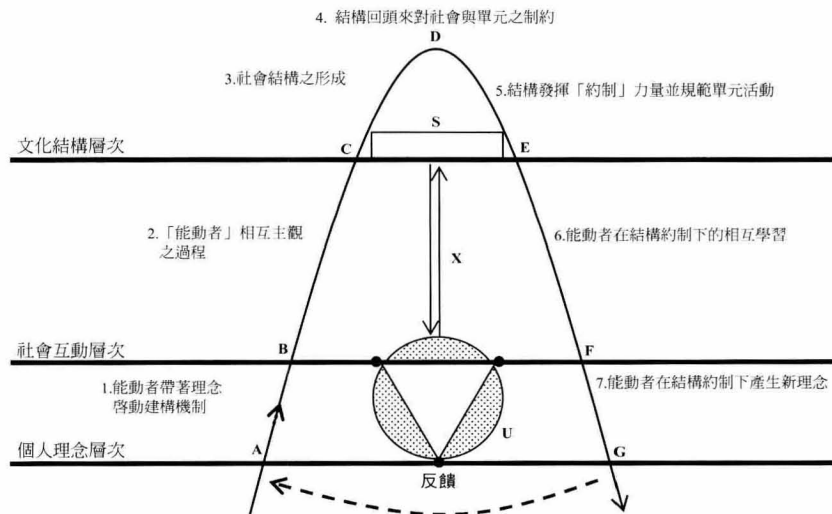


圖 4 建構主義理論之分析層次模型

圖例：

S為結構，即國際體系層次；體系由個人理念以及能動者之間的互動所構成，而結構又會反過來影響能動者。U為單元層次：單元橫跨社會互動層次以及個人層次。X為國際體系與單元間之互動形成一種動態的相互建構。

資料來源：宋學文，「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及模型建構」，問題與研究（臺北），第 47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187。

一、確立跨層次的概念架構

圖 4 中， \overline{AB} （相對應為 \overline{FG} ，以下均同）為個人觀念層次之分析，而 \overline{BC} （及 \overline{EF} ）為單元間互動層次的分析， \overline{CD} 為結構成形（ \overline{DE} 為結構制約）的結構分析層次，單元與結構（包含互動層面）的本體區分有較為清楚的表陳。

二、確立結構形成與制約的過程

圖 4 中，個人理念層次（ \overline{AB} ）之能動者抱持某種原生理念想法，當它尚未進入社會層次前，該想法的影響力僅止於能動者自身。能動者一旦跨出個人層次進入社會互動層次（ \overline{BC} ），該原生理念將與社會層面其他能動單位進行互動，而進入辯證的社會互動過程。此等動態的辯證過程最終將塑造出某種文化結構（ \overline{CD} ）。此種文化結構亦將形成一種帶有社會規範之結構，回過頭來成為制約能動者的力量（ \overline{DE} ）。能動者在文化結構制約下再度透過學習並適應其與其它能動者的互動（ \overline{EF} ），最終也促使能動者重回個人理念層次並透過學習、調適形成新的理念（ \overline{FG} ）。在此過程中，圖 4 清楚地顯示由 $\overline{AB} \rightarrow \overline{BC} \rightarrow \overline{CD}$ 間的單元透過互動而形成結構過程（結構形成段）；以及 $\overline{DE} \rightarrow \overline{EF} \rightarrow \overline{FG}$ 間結構制約單元過程（結構制約段）。

三、確立學習與調適的反饋過程

在圖 4 中，結構制約段的最後，單元在結構的制約下產生新的理念，此一新的理念經由反饋線（ \overline{GA} ）進入新一輪循環的建構互動過程，週而復始。

四、確立相互建構的過程

在圖 4 中，來自於結構與單元之間的相互建構（X），既使得結構（S）產生的轉型（C 點至 E 點）；也使個體（U）的理念透過學習適應而被再形塑（A 點至 G 點）。

五、對極端國家核心論的保留

圖 4 也顯示本文作者對於 Wendt 將國家逕視為個人之極端國家核心論立場的保留態度，這顯現在個體（U）座落在社會互動與個人理念的中間位置與 U 內部尚有複雜互動的表陳，顯示深入探討國家個體內部互動狀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圖 4 呈現了建構主義的主要論點，包括：個體的國家利益或理念都是透過互動而形塑，可以學習而改變；結構也不是既定與靜態的，而是個體在互動過程中相互建構而產製與再產製。而且也藉由突出前述（V）點，而拉近了不斷回饋、不斷建構與不斷轉型的能動者／結構關係與透過（U）決策所呈現出的國家能動性間的關係。¹⁵⁵

註 155 以上部分論點出於：宋學文，「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及模型建構」，頁 187-188。

陸、結 論

在國際關係理論化發展過程中，不僅各種理論推陳出新，激起一波波的檢驗、爭論與修正，鮮少理論有長治久安的可能。而且此等論戰經常發生在互異的場域，並使用難以互通的語言，除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外，跨界（如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等）的需求越來越大，各種理論不同的本體論立場更撼動學科既有的邊界。

誠如本文第貳節中所指出，本體論為研究之始，辨明不同的本體論立場有助於不同的理論的瞭解，更可探索理論所從屬之學科的邊界。對於建構主義對於國際關係學科的貢獻，並不在於 Wendt 與其他建構主義者能不能「推翻」結構現實主義——這並沒有公認的答案，¹⁵而是建構主義者提供了深刻的省思讓研究者檢視過去的研究成國。在此基礎上，知識的累積才有意義。對此，建構主義者超越了同期大部分對結構現實主義論點的批判，建構主義超越了理論的實質主張、實徵上或認識論上的辯論，針對能動者／結構與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兩個本體論上的議題（本文僅討論第一項），提出了後設理論自省性的探討。

理論的發展免不了以本體論的假定為先行基礎，本文就能動者／結構範疇內的相關概念進行闡述，就建構主義若干重要論點在社會學上的根源提出粗淺的引介。在闡述的過程中，作者也對幾項建構主義者在概念上引起爭議之處——包括了 Wendt 將國家巡視為個人的論點與 Wendt 所提認識論上「中間道路」在本體論上的立論基礎等，提出補充。在此一基礎上，開始進行國際關係內建構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在能動者／結構爭論的探討。針對建構主義者對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兩項批判——Waltz 實乃個體主義者與 Waltz 忽略能動者的能動性，本文認為：前項批判仍須斟酌，Waltz 的觀點固然與 Levi-Strauss 與 Wallerstein 的結構主義有段距離，但仍不失為一薄弱形態的結構主義。而後項批判言之有理，儘管 Waltz 做了許多在方法論上向單元層次傾斜的修正意見，他在本體論上依舊欠缺對能動者的能動性與該能動性可轉型結構的相關認識。最後，基於分析層次在本體論上能動者／結構爭論時的重要性與必然性，本文認為分析層次的表陳是建構主義者在理論發展上不能迴避的挑戰，而作者具體地以提出一個較能掌握建構主義動態性、系統性、具回饋效果與非純然線性關係特點的分析層次表陳。

* * *

（收件：99 年 12 月 2 日，接受：100 年 6 月 27 日）

註 15 許多結構現實主義者並不認為建構主義比結構現實主義可信，如 Andreas Behnke 認為：即令有 Wendt 的論述，結構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大部分都並未動搖；Wendt 的論述「部頭很大，理論很少」（thick book, thin theory）。見：Behnke, "Grand Theory in the Age of Its Impossibility," pp. 49-51, 55.

Agent and Structure: The Ontological and Level-of-Analysis Debates

Hseik-Wen Soo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ork W.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ll research begins with ontology.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 discrepancies and the least conclusive contests in this regard between Structural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since the late 1980s. Though politics is the terrain of competing ontology; definite and clear-cut answers are hardly attainable, a serious discussion on ontological issues can lead us to penetrate the assumptions deeply embedded in both theories.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s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and next unpacks related concepts -- such as agent, agency, and structure -- as well as their origins in sociology. In the process, some conceptual controversies over state agency and ontological core of epistemological *via media* in Wendt's theorization are also briefly discussed. This article then turns to constructivist's two-front criticism against Waltz's Structural Realism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Waltz is in fact an individualist and his ignorance about agency. After summarized and examined Waltz's arguments in respect of state as "unit," "emergence" of

structure, “property” of structure, structural “effect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ough Waltz’s theory, in strict terms of structural determinism, does not match with those thick Structuralism proposed by Levi-Strauss or Wallerstein, it is nevertheless better to see Waltz’s theory as a thin Structuralism if Waltz’s serious efforts to differentiate structure from agent and his theoretical responsiveness to Durkheim are properly appreciated. Waltz later makes many methodological amendments that lead his arguments more unit-level oriented; however, such efforts cannot bridge the existing gap between hi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since his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about agent’s agency and its potential to transform the structure are both wanting. Last, the significance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oretical parsimony implied in the illustration of level of analysis are highlighted; so constructivists, who cherish the complexity in their theory, may find unwarranted not to engage such an illustration. Thu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llust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monstrating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Waltz and Wendt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Keywords: Structural Realism, Constructivism, Ontology, Agent/Structure, Level of Analysis

參考文獻

- 宋學文,「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及模型建構」,《問題與研究》(臺北),第47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67-199。
- 莫大華,「國際關係後現代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立場」,《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究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政治學系:2010年5月),第3場,第2篇,頁1-19。
-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年3月),頁1-23。
- Adler, Emanuel,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95-118.
- Ashley, Richard K.,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55-300.
- Behnke, Andreas, "Grand Theory in the Age of Impossibility: Contemplations on Alexander Wendt,"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48-56.
- Benton, Ted and Ian Craib,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ough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 Berger, Pet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1966 [1991]).
- Bhaskar, Roy,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Brighton: Harvester, 1978).
- Bhaskar, Roy,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1979 [1998]).
- Bhaskar, Roy,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1986).
- Bhaskar, Roy, *Reclaiming Realit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1989).
- Bhaskar, Roy,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1993 [2008]).
- Blaikie, Norman,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Booth, Ken, *Theory of World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uzan, Barry,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1997]), pp. 198-216.
- Callinicos, Alex,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Carlsnaes, Walter,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3 (1992), pp. 245-270.
- Cox, Robert W., "Towards a Posthegemonic Conceptualization of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 on Relevancy of Ibn Khaldun (1992),” reprinted in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4–173.
- Cox, Robert W.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rotty, Michael,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Meaning and Perspectiv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London: SAGE, 1998).
- Dessler, David,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3, No. 3 (1989), pp. 441–473.
- Durkheim, Emile,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lated by Sarah A. Solovay and John H. Mueller, edited by E. G. Catlin (New York: Free Press, 1895 [1938]).
- Fay, Bria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Multicultural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1997 [1999]).
- 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Friedman, Gil and Harvey Starr,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Ontology to Empir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 Giddens, Anthony,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6).
- Giddens, Anthony, *A Contemporary Critiqu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1).
-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1999]).
- Gould, Harry D.,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M. E. Sharpe, 1998), pp. 79–98.
- Guzzini, Stefano and Anna Leander, “Wendt’s Constructivism: A Relentless Quest for Synthesis,”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73–92.
- Hay, Colin,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 Hopf, Ted,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pp. 171–200.
- Hurd, Ian, “Constructivism,”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10]),

pp. 298~316.

Jorgensen, Knud Erik, "Four Levels and a Discipline,"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Armonk: M. E. Sharpe, 2001), pp. 36~53.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K.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K.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pp. 5~45.

Kendall, Gavin and Gary Wickham, *Using Foucault's Methods* (London: SAGE, 1999 [2000]).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Klotz, Audie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monk: M.E. Sharpe, 2007).

Kratochwil, Friedrich,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in Christian Reus-Smith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10]), pp. 444~461.

Kubalkova, Vendulk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Constructing Constructivism,"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M. E. Sharpe, 1998), pp. 3~21.

Kukla, Andr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Lose, Lars G.,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World of Diplomacy,"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Armonk: M. E. Sharpe, 2001), pp. 179~200.

Luhmann, Niklas,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Jr. with Dirk Baecker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1984 [1995]).

Lukes, Stephen,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McSweeney, Bill,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rgan, Patrick M.,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75 [1981]).

Onuf, Nicholas G., *The Republican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Onuf, Nicholas G.,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Onuf, Nicholas G.,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M. E. Sharpe, 1998), pp. 58~78.
- Robson, Colin, *Real World Research: A Resource for Social Scientists and Practitioner-Researchers* (Oxford: Blackwell, 1999).
- Ruggie, John Gerard,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K.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pp. 215~245.
- Reus-Smit, Christian, "Constructiv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1996 [2005]), pp. 188~212.
- Sayer, Andrew,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1984 [1992]).
- Smith, Mark J.,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1998).
- Suganami, Hidemi, "Wendt, IR, and Philosophy: A Critiqu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57~72.
- Trigg, Roger,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Blackwell, 1987 [1997]).
- Viotti, Paul R.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Longman, 1993 [2010]).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s a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Longman, 1993 [2010]), pp. 225~236.
- Waltz, Kenneth N.,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1959]).
- Waltz, Kenneth N.,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1964)," reprinted in Kenneth N. Waltz,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99~122.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1979 [2010]).
- Waltz, Kenneth N.,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1986)," reprinted in Kenneth N. Waltz,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7~55.
- Waltz, Kenneth N.,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1990)," reprinted in Kenneth N. Waltz,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67~82.
- Wendt, Alexander E.,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 Wednt, Alexander E.,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83~392.

- Wendt, Alexander E.,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 Wendt, Alexander E., "Levels of Analysis vs Agents and Structur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1~185.
- Wendt, Alexander 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endt, Alexander E.,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s,"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81~219.
- Wight, Colin,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